

東山

濟南工运史料

第三辑
(内部资料)

刊

济南市总工会工运理论研究室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济南工运史料

第三辑

(内部资料)

济南市总工会工运理论研究室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胡耀邦同志关于史料整理工作的批示 (1)

回 忆 录

- 忆抗战初期济南的地下斗争 王见欣 (4)
在济南地下工作的五年 马 进 (18)
我们对济南市工人学校的回忆
徐明、李洛夫、李世龙 (26)
解放初期工业局四厂工运概况 高登奎 (37)

专 题

- 一九二三年济南理发工人的罢工斗争 本 室 (46)
原机车工厂老工人五四运动回忆片断
..... 李成才、井明 (62)
八路军在章丘开办小煤矿情况简介
..... 李新泉 李松柏 (66)
老矿工对抗日战争时期章丘旭华煤矿公司情况的回忆
..... 李新泉、李松柏 (68)

工 运 人 物

- 宋伯行传略 明义 暴虹 (74)

- 薛文英传略 李成才、朱长智 (81)
解放初期工运座谈会发言摘要 (86)

资料选登

- 济南市第一届工人代表大会资料选登 (103)
出席工代大会代表名单 (103)
中华全国总工会致电预祝大会成功 (106)
山东省人民政府贺信 (107)
济南市人民政府贺词 (108)
警备政治部贺信 (109)
上海总工会筹委会致电大会祝贺 (110)
王韬同志在预备会上关于代表资格审查
 经过的报告 (111)
开幕典礼程序 (115)
大会主席团名单及大会常务主席和
 各委员会名单 (116)
为祝贺大会胜利召开，各厂掀起增产节约运动
 情况简介 (118)
关于恢复发展生产问题 刘顺元同志在济市工代大会
 上的报告（摘要） (136)
济南市工运工作摘要 沈鹰同志在大会上的报告 (144)
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迎接济南解放一周年
 的决议 (156)
济南市公营企业战时劳动保险暂行条例 (158)
济南市私营工商企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
 暂行办法 (165)

沈鹰同志关于提案的解答报告	(168)
济南市总工会第一届执委会名单	(183)
大会通电	(184)
编 后	(193)

胡耀邦同志 关于史料整理工作的批示

乔石同志：这本东西①我留下了，慢慢翻，现在提不出什么意见。我们整理各种史料的工作作得太差，这些年有进步，但还不全面和认真，我意应要求各有关部门进一步注意。

胡耀邦
三月十一日

附一：

乔石同志的批示

一民同志：这本书可否告档案馆同志，在可能情况下给予帮助。耀邦同志的批示精神请告有关部门。

乔石
三月十二日

注①这是指王健英同志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初稿）一书。

附二：

王健英同志的信

胡耀邦总书记同志：

您好！您是全党操心最多、工作量最大的中央主要领导人，本不应打扰您。因为事关党的组织史方面问题，只好向您请示。现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初稿），呈请您审阅。编写这种全党组织史方面材料，是极其严肃、影响深远的工作，本不应是我这个后勤学院党史教员来承担并能搞好的。可能由于党内长期以来还缺乏这类综合性较系统的材料，随着全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和编写中共党史正本工作的进展，对党的组织史材料收集整理研究也需着手准备。红旗出版社发现我编写的这本初稿后，经送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同志审阅同意内部印发，以便向中央领导、老同志、熟悉情况者和党史界广泛征求意见，作进一步修改。虽然我长期以来注意收集积累和研究这方面材料，特别在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在党中央关于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勇于探索的号召指引下，经过四年努力编写出这本初稿。但是，由于我所能收集、看到的材料有限，尤其有关档案材料难以根据内容需要去查对，加上我有教学任务，也难以更多地向老同志访问请教。因此，这本初稿无论内容准确性、或体例编排等，都存在不少问题。内部印发，在一定范围内征求修改、更正、补充意见，以求进一步修改得更符合历史实际。殷切希望如有可

能，请您在日理万机之余抽暇过目。请您对内容、体例，如何编写修改，给予指示。

专此，谨致

敬礼

后勤学院政治教研室 王健英

一九八四年三月八日

忆抗战初期济南的地下斗争

王见欣

一九三七年，在黄河铁桥被炸的那一天下午，整个济南市乱成了一团。商店都抢着关门，满街碰碰撞撞的汽车、人力车，拉着最后一批国民党的官员和有钱人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以及他们装满细软财物的箱柜，拥向火车站。我们山东省委和平津同学会最后一批同志，同打着“前线慰问团”旗帜的同志也一起爬上了拥挤地透不过气来的车厢，随着悲鸣的汽笛声，告别了即将失守的济南市，而转移到发动人民武装抗日的新战场。山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相继在徂徕山、蒙山、长山、天福山、铁山、抱犊崮等地，迎着严冬飞雪，举起了抗日义旗。抗日烈火在山东大地上燃烧起来。

一九三八年冬，我在山东分局任敌占区工作科长。次年三月，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又指定我和韩文一、黄在（我的爱人）三同志组成了济南市工作委员会。由我任书记，黄在任组织委员，韩文一任宣传委员。给我们的任务是按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聚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打入济南市。

韩文一同志在济南、青岛两地都有家，并有许多上层关系。一九三九年三月底在青岛他的家里和我们约

定，到济南后在他的朋友鲁麟洋行经理毛晓亭那里会面。

黄在同志的大舅在济南当火车司机，我们想以此为依靠落脚，为应付敌人盘查所预备的“口供”是：“慌乱中流落于山东亲友同学家，现在时局较稳，转回原籍谋生。”我们按小学教员的身份经过充分准备，化装后就出发了。

几经周折来到济南。但是，我们没有找上黄在的大舅，就只好又转道去天津黄在家里落脚。我们按编造的来历领了户口和良民证。与韩文一同志约定会面的时间快到的时候，黄在却病了，我就只身到济南与韩文一接头。

四月初的一天下午，我到达了济南。在纬十路路东有一个朝西的大门，门垛上挂着一个方形的铜牌——鲁麟洋行。我进门对一位看门的老头说：“我找毛经理。”老头问：“你贵姓？”我告诉他姓王，他说：“请你等一等。”他走进去一会，很快回来告诉我说：“请你上楼。”我上到二楼，毛晓亭正迎着楼梯站着伸出右手，自我介绍说：“我是毛晓亭，你是？”我很快回答说：“我是王见欣。”毛晓亭说：“久仰，久仰，请屋里坐！”我们手拉手走进他宽敞的办公室，毛经理让我在一个圆形茶几旁的紫红色丝绒沙发上坐下。他说：“文一兄来信说过了，我很欢迎您来，住处已给你们安排好了，不过文一兄还要过几天才能来，韩大嫂神经不大正常，他要作些安排。”毛晓亭一面说着一面递给我一支烟，公务员送来一杯茶。我说：“我们分手后还没有通过信，对他的近况不清楚，这一来可给你增加麻烦了。”他说：“不要客气，我和老韩是老朋友，我对他是了解的。这两年我们虽然没见面，但是我知道他的行踪，我敬佩你们，既来之则安之。我们虽然是初识，但一见如故，不必见外，只要我能办到的，

我当尽力而为。”毛经理很诚恳地讲了这些话，使我感到他对我们面目完全清楚。他敢于接待我们，掩护我们，固然是由于他和韩文一同志是老友。但当前的民族矛盾，对他来说也是摆在头等地位的，这是我们和他在政治上的一致性。既然如此，对他就该“以诚相见”，不要遮遮掩掩。所以我接着他的话说：“知己不套，朋友之交贵在志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老兄对我们慷慨相助，我很感激。当然这也是我们的共同事业。”毛经理紧跟着说：“我只是希望不要把我这个摊子搞垮。”说着，我们都哈哈大笑一阵。我说：“我们当十分小心从事。”经过这样一段热情的交谈之后，他引我到安排得很舒适的一间宿舍住下，晚上请我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就这样在鲁麟洋行住了下来。

毛经理也很想知道一些抗日的情况和前途。因此我就给他介绍一些情况，并把《论持久战》等书给他看，对他表示信任。同时又从政治上给一些启发诱导，这样我们的朋友关系有了较深的政治基础。

大约是五月初，文一同志从青岛来了，他的许多老友为他接风，连续请了几次客，来往很活跃。我也认识了文一的许多老友。

文一同志来了以后，我们首先研究的就是职业掩护问题，这件事又要靠毛经理帮忙。当我们向毛经理提出这个问题时，他的意见是叫文一做他的副经理，我们当然很满意了。那么我怎么办呢？当时鲁麟洋行经营着一个复兴印刷公司，毛经理说：“我可以帮你搞一个小印刷局。”就这样，在毛经理的支持下，他介绍了李伯玉给我当助手，借给我两台石印机，在城隍庙街开办了一个新生印刷局。

我和文一同志的职业都有了。文一同志就在东门外找了几间房子，把他老伴和女儿接了来。我在王榜副斜街找了两间东屋，也通知黄在来济南。这样我们工委的三位同志，算正式落住了脚。

既要“隐蔽、埋伏”，又要积极地开展工作，从哪里入手呢？从当时情况看，和我们最接近的还是鲁麟洋行的职工。可是毛经理早已暗示过，不要在洋行里的工人中发展组织。但事实也很难避免，经常来往于洋行，他们的工人对这些陌生的客人总是要打听一下来历。时间长了若明若暗的会知道一些我们的为人，甚至政治面目。特别对韩文一是什么人，他们是略知一二的。而且我们也应该深入到他们中间去和他们交朋友。

尖锐的民族矛盾，使职工的反日情绪和心理上趋向一致。在职工中一说起抗日问题，虽然都很害怕，但是还都想了解一下抗日情况。当我们和有些工人互相熟悉了之后，一谈起时局，他们就对日本帝国主义有满腔仇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他们逐步地讲一些国际国内形势，和他们一起读报分析问题，还把从旧书摊上搜集来的进步书刊，如：《帝国主义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政治》、《新哲学大纲》、《三个叛逆的女性》等，送给他们看。我们从根据地带来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书，也分别不同情况送给他们传阅。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在鲁麟洋行先后发展了成本会计刘瑞庆、检字工李尔文、绘图工李伯玉、王在位。这是我们进入济南发展的第一批党员。之后，王在位发展了学徒工王俊仁，李伯玉发展了他叔叔小学教员李惠东。毛晓亭介绍他亲戚铁路工人张立溥来为我们做情报

工作，经过一段时间也被发展为党员。韩文一又介绍曾在《进德月刊》任过编辑的董绶青和仁丰纱厂职员于寿亭入党。与此同时，我发展了在德生润染料庄做店员的我本家同学王澄湘，又发展了曾跟我念过书的某染料庄的店员王继曾为党员。因为我在抗战前和抗战开始的活动他们都清楚，特别是王继曾和我见面后，一再说：“我现在想起来，过去在学校的斗争中不够积极，从这实际生活体验中，才明白老师走的道路是对的，我愿积极参加革命工作。”这是进入济南发展的第二批党员。

又经过一段时间，于寿亭同志发展了仁丰纱厂的小职员唐守松。唐守松又发展了仁丰纱厂的工人李健吾。韩文一发展了东门外鹅鸭房小学的教员徐子常。通过董绶青的关系又发展了复兴印刷公司的营业员马鹏九，日本商行的店员郭界娱（是董的妻妹）。后来又发展了泰安的张琢庵。这是进入济南半年多以来发展的第三批党员。

在这一段过程中，还认识了韩文一同志的一个表弟宋荫培，这人当时在水道局做事，他和文一接触比较多。有一天文一和我说：“宋荫培和我谈起了斯大林是‘干部’派，是‘独裁者’等等。”我听了以后对文一说：“要注意，这个人不简单，似乎像托派。”文一又说：“过去这人在青岛大学读书，曾经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被捕过”。他这一说，更引起我的警惕，他很可能是一个叛徒。从此我们就注意了这个人。

一九三九年夏天，我和文一同志在纬五路一带逛大街，忽然有人叫住了老韩，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周兰田同志。我问：“你从哪来？”他说：“我是来找你们的，几个月没见

到你们三位，家里不放心。”我问他：“住在哪里？”他说：“住在表哥家里。”他写了一个地址给我，要我晚上找他。晚饭后我按他给我的地址，到了南岗子木工王瑞庆家里，找到了周兰田同志。我与党组织离开了半年，见到组织派来的人感到分外亲热。他把后方反扫荡的胜利和政权的建设等情况告诉了我们，并说：“分局要我来，是因为鲁西区党委交给我们一个有十多个党员的支部，我负责来接这关系，并把这个支部转交给你们。王瑞庆同志就是这个支部的党员。这个支部的书记是蔡子程。”我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并把我们的工作情况向周兰田同志作了汇报，随后我们就研究如何接收这个支部。我的意见是不要按一个完整的支部来接收，要采取个别接头、谈话和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观察，一个一个的接受，周兰田同志完全同意了我的意见。

第二天，我和周兰田同志一起到了蔡子程同志家里。他家是一个比较幽静的小四合院，房舍不甚宽大，但有些古色古香，正房窗明几净，满屋都是字画图书。子程同志的父亲是一位文质彬彬的老夫子，子程是一位精干而带有点骄矜气的还没有职业的青年。经周兰田同志介绍之后，我们听取了子程同志的汇报。他首先谈到这个支部原来的支部书记是陈隐仙。陈隐仙是一个很严谨朴素的人，早些时候被捕入狱，在狱中一直英勇顽强地坚持斗争，最后壮烈牺牲了，使我们党组织没有遭到任何破坏。我们听了都肃然起敬，潸然泪下。都表示要向陈隐仙同志学习，并决定借此在同志中进行气节教育。随后子程又逐个介绍了该支部每个党员的情况。最后我们根据子程同志的汇报，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讲了讲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并拟定了一个短期工作计划。于是我们就按计

划开始分工谈话，进行接收党员的工作。我负责接头的是蔡子程、辛树声、赵舵、马茨唐、张景林、邵厚仁六个人。周兰田负责王瑞庆、王乐亭、马××和他爱人以及胡老头兄妹六人。黄在同志负责邵淑岩（女）和一个蒋××（女）。

经过了解，蔡子程同志因陈隐仙的被捕有些暴露，不宜于留济南工作，他和邵淑岩有恋爱关系，也都希望到后方学习。邵的父亲邵锡吾当时是济南市电务局的高级职员，和蔡的父亲是老朋友，他对邵淑岩和蔡结婚后去根据地不放心，要求和我见面对谈，我就慨然应允了。我和蔡子程到他家里见了邵锡吾，和他谈抗日形势和国际形势以及我们的路线、政策。当说到我们的统战科长赵笃生同志时，他说我们是老同事，于是他表示：“把女儿交给你们往正路上领，我就放心了。”子程和淑岩就悄悄的结了婚，由周兰田带他们到鲁南区党委分配了工作。

辛树声是该支部的宣传委员，他是辛葭舟的儿子。当时是中学毕业后还没有职业的青年，比较纯洁、热情。赵舵是支委之一，是一个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性格比较倔强，不够细致。

马茨唐是个年纪比较老的爱好文艺的教员，他爱人张景林性格比较泼辣，带着几个孩子，生活比较窘迫，也有些暴露。因此，都愿到根据地去工作。按照他们的状况，过了些时候，就介绍他们到鲁中区党委分配工作了。

邵厚仁是一个好夸张不够踏实的大学生，思想不大纯正，各方面关系也比较复杂，最后考虑放弃了这个关系。

由周兰田负责的几位同志都是木工、小贩和手工业者，都没什么问题。

由黄在同志负责的除了邵淑岩外，还有邵的一个姓蒋的同学。经了解蒋比较消沉，就决定放弃了。该支部的十四个党员，我们接收了十二个。

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已经有二十八个党员，除去到根据地工作的五人还有二十三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工作就有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我们深入到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针对不同对象把从根据地带来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以及其他小册子，给他们阅读。我们还散发传单，并曾用铅字在一、二分钱的纸币后面印上标语口号和简单明了的宣传内容散发。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我们同一些进步群众建立了一定的联系。例如：我们在火车站、个别的日本洋行、新民会以及国民党驻济南华北办事处等地方建立了关系，通过他们收集有关情报。随之我们就又进行组织发展工作。赵舵同志发展了铁路工人王云程和一位姓陈的老工人入党。我亲自和他们谈了话，还举行了入党仪式。辛树声发展了在鹊华桥开饭铺的张强和王林。黄在同志发展了辛树声的爱人刘敏，董缓青介绍了王鹤，后来也吸收他入了党，送抗大分校学习。

大约截止到一九四〇年六、七月份，组织状况就发展到以上的程度。

既要隐蔽又要开展宣传工作和发展党组织，暴露是难免的。特别是时间一长，有的同志警惕性就松驰了。暴露较突出的是韩文一同志，他所认识的社会关系，差不多都了解他是八路军。他住在东门外像个花园样的大杂院里，早晨起来散步时他唱国际歌。我们批评他：“你怎么在那样的地方唱国际歌？”他说：“哼！他们不懂得。”他的内弟宋荫培有一

次问我住什么地方，我支吾了一番没告诉他。我估计这人居心不良，更提高了对他的警惕。由于这些情况的存在，我们认为韩文一同志不适合于敌区工作，故于九月间决定叫文一回了根据地。韩走了之后，我们就断绝了与宋荫培的联系。在一个秋季的下午，我和黄在正在中山公园散步，忽然遇上宋荫培，他又问起我们住哪里，我只是说住在董绶青附近。以后虽然再没见到他，但我一直是担心在他那里出问题。

由于我同院一个姓阎的从我的本家那里得知我在抗战前是共产党，因此他很注意我，他还常叫他老婆在我窗下偷听。这对我构成了直接威胁。

就在这个时期，有一次我到城顶德生润染料庄去找王澄湘。一进门正看见我县国民党书记长王铁甫坐在帐桌上。此人是地主兼资本家，与我村相距六里路，他完全知道我的政治面目，而且抗日之初，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时，他代表国民党，我代表共产党曾一块开过会，研究抗日后援会的成立问题。他见我进去装作没看见，站起来转向右面照镜子。我也装没看见他，找到王澄湘办完了事就走了。与此同时又发生了一件事，作为我们与后方通信联系地址的德生润染料庄，有一封来信落到了他们经理手里，他们经理把这封信送到了日本宪兵队。

多方面的被暴露，使我意识到再长期留在济南，肯定要出大问题。同时鉴于离开根据地已一年半时间，也很需要回山东分局去汇报工作。于是在一九四〇年七月份就决定九月份回根据地去。我知道到了根据地之后，能否再回来不敢肯定。因此，当时决定按不回来做打算。在当时，辛树声资